

中国文学发展史

刘大杰 著



中国文学发展史

第二册

刘大杰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中国文学发展史

第二册

刘大杰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6.25 插页2 字数 373,000

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71·615 定价: (平) 1.3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	1
一	引言	1
二	唐代社会概述	4
三	唐代文学的发展	8
	诗歌	8
	散文	12
	小说	13
	敦煌文学	14
四	唐代文化的特点与交流	18
	唐代文化的特点	18
	唐代文化的交流	20
第二章	初唐文学	25
一	贞观时期的文学	25
	李世民及其作品	25
	虞世南与上官仪	28
	唐初文学的新倾向	31
	魏征	31
	李百药	35
	马周	37
	王绩	39
二	武则天时期的文学	41
	武则天及其作品	41

初唐四子与其他诗人	44
王勃	44
杨炯	49
卢照邻	50
骆宾王	51
刘希夷与张若虚	53
律体的完成	54
沈佺期与宋之问	55
杜审言	56
第三章 陈子昂与刘知几	58
一 陈子昂的生活与政治思想	58
陈子昂的生活	58
陈子昂的思想	61
二 陈子昂的作品	65
陈子昂的诗论及其诗歌	65
陈子昂的散文	70
其他诗人	72
张说	72
王湾	73
贺知章	73
张九龄	74
三 刘知几的生活与思想	74
刘知几的一生	75
刘知几的思想	76
四 刘知几的文学观	83
第四章 边塞诗人与田园诗人	90
一 边塞诗与田园诗的社会基础	90

	边塞诗的社会基础	91
	田园诗的社会基础	95
二	边塞诗人	97
	岑参	97
	高适	106
	王昌龄	114
	王之涣	119
	李颀	121
	崔颢与常建	122
	边塞诗派的共同倾向	124
三	田园诗人	125
	王维	126
	孟浩然	135
	储光羲	140
	韦应物	141
	田园诗派的共同倾向	143
第五章	李白的阶级地位与诗歌艺术	144
一	李白的时代	144
二	李白的一生	146
三	李白的阶级地位	157
四	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	162
五	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	177
六	李白的追慕者	185
	任华	186
	张碧	187
	卢仝	188
	刘叉	189

第六章	杜甫与大历间诗人	192
一	杜甫的生活	192
二	杜甫的思想	200
三	杜甫的作品	209
四	李白与杜甫	221
五	元结及大历间诗人	225
	元结	225
	苏涣	228
	戴叔伦、顾况与戎昱	229
	刘长卿	231
	李益	232
第七章	柳宗元与古文运动	234
一	古文运动及其分野	234
二	柳宗元的生平与思想	245
	柳宗元的生平	245
	柳宗元的思想	248
三	柳宗元的散文	254
四	柳宗元的诗	266
五	刘禹锡及其作品	268
	哲学观点	269
	政治思想	271
	文学成就	274
六	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	280
第八章	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	294
一	新乐府运动的社会基础	294
二	白居易的生活和思想	297
	白居易的生活	297

	白居易的政治思想	299
	白居易的文学思想	305
三	白居易的作品	310
四	白居易创作思想上的转变	324
五	张籍和王建	327
	张籍	327
	王建	330
第九章	唐代的短篇小说	335
一	唐传奇繁荣的原因	336
二	唐传奇发展的前阶段	342
	《补江总白猿传》和《古镜记》	343
	张鷟的《游仙窟》	345
	《开元升平源》	348
三	唐传奇发展的第二阶段	350
	沈既济和许尧佐	351
	柳宗元与沈亚之	355
	李朝威与李公佐	357
	蒋防与《白行简》	360
	元稹	364
	陈鸿、牛僧孺和李复言	365
	皇甫枚	373
	皇甫氏	375
第十章	李贺、李商隐及晚唐诗人	379
一	李贺及其作品	380
	李贺的思想	380
	李贺诗歌的社会内容	383
	李贺诗歌的艺术特色	390

二	李商隐的生活与思想	393
	李商隐的生活	393
	李商隐的思想	398
三	李商隐的诗	400
四	杜牧的散文与诗歌	416
	杜牧的思想与散文	416
	杜牧的诗歌	422
	其他诗人	425
第十一章 唐代的说唱文学		427
一	敦煌文献的发现	427
二	唐代说唱作品的类别	429
三	转变与变文	431
四	说话与话本	443
五	俗讲与讲经文	450
六	变文、话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	453
第十二章 唐代末年的文学		456
一	唐末社会与黄巢的诗	456
	黄巢及其诗	458
二	皮日休及其他作家	459
	皮日休的生活	460
	皮日休的思想与散文	461
	皮日休的诗歌	463
	陆龟蒙	465
	聂夷中	468
	于濬	470
	杜荀鹤	472
	罗隐	474

三 司空图与韩偓	477
司空图	477
韩偓	480
第十三章 词的兴起	482
一 词的起源和发展	482
二 敦煌曲子词	488
三 唐五代词	494
李白的词	494
刘禹锡与白居易	499
温庭筠	500
花间词	503
南唐词	508

第一章 唐代社会与文学的发展

一 引 言

隋文帝(杨坚)是一个鄙弃儒学的人。《隋书·儒林传》说他,“不悦儒术,专尚刑名。……暨仁寿间,遂废天下之学,唯存国子一所,弟子七十二人。”可见在其统治时期儒学衰落的情况。他所重用的人,大都不是儒生。当时称为巨儒的二刘(刘焯、刘炫),一个“配之军防”,一个“冻饿而死”。杨坚在北周夺取了政权,建立隋朝,于开皇九年(五八九)击败陈后主(叔宝),结束了自东晋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,统一了中国。他以后又击败了突厥统治者的侵扰,保障了北方的安全,并在政治上进行了一些改革,如采用均田制,开垦荒地;改革官制,建立五省六部制度;废除九品中正制,推行科举,等等。当然,他所采取的这些措施,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政权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他所推行的这些政策,在发展社会经济、削弱豪强方面,起了一定作用。

杨坚的儿子杨广(隋炀帝),一登上帝位,就大反他父亲的法家路线,大搞尊儒崇孔。首先是恢复他父亲废去了的儒学。“杨帝即位,复开庠序,国子郡县之学,盛于开皇之初。征辟儒生,远近毕至。”(《隋书·儒林传》)并且连下诏书,歌颂孔丘功德:“先师尼父,圣德在躬,诞发天纵之姿,宪章文武之道。”(《隋书·杨

帝纪》)立孔丘后代为绍圣侯。杨广自己是以儒道著称的。他在做太子以前,善于用“克己”和“仁孝”来伪装自己,对他母亲装作一个“孝子”,对父亲表示“忠心”,在生活上乔装打扮,表示厌恶声色。他这种言行不一、虚伪透顶的行为,不单是博取了他父母对他的信任,而且宫廷内外,无不赞美他是一个“德行高尚”的继承人。结果,他父亲把原来的太子杨勇废了,立他为太子。《隋书》说他“每矫情饰行,以钓虚名”;“尤自矫饰,当时称为仁孝。”(《杨帝纪》)他就这样一面培养“声誉”,一面准备实力,最后是杀死他的父亲,再杀死他的哥哥,并且把他父亲的两个妃子也据为己有,就这样做起皇帝来了。史书上既说他“称为仁孝”,又说他“弑父杀兄,恣淫无度”,正说明他口里讲的是“仁义道德”,“礼义廉耻”,而其所作所为,实际都是禽兽之行。可以说,杨广是历史上儒家两面派的典型。他做了皇帝以后,进行极其残酷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,使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;对外是三征高丽,进行劳民伤财的非正义战争,逼得人民走投无路,家破人亡。如此尖锐的阶级矛盾,激起了穷苦人民的强烈怨恨和反抗。

我兄征辽东,饿死青山下。今我挽龙舟,又困隋堤道。
方今天下饥,路粮无些少。前去三千程,此身安可保!寒骨枕荒沙,幽魂泣烟草。悲损闺内妻,望断吾家老。安得义男儿,悯此无主尸。引其孤魂回,负其白骨归。(《挽船夫歌》,见刘斧《青琐高议·隋炀帝海山记》)

长白山前知世郎,纯著红罗绵背裆。长槊侵天半,轮刀耀日光。上山吃獐鹿,下山吃牛羊。忽闻官军至,提刀向前荡。譬如辽东死,斩头何所伤!(《隋大业长白山谣》,见杨慎《古今风谣》)

要抗兵,要抗选(反抗炀帝选民女),家家要把铁器敛。

敛起铁来做成枪，昏君脏官杀个光。（《王铁匠歌》，见《中国民间故事选》）

杨广三游江都，坐着特制的高有四层的龙舟，带着大批的宫妃、歌伎以及文武百官、僧尼、侍从、乐工等等。船队相接，首尾二百余里，共用挽船夫八万余人。骑兵夹岸护送，耀武扬威。巡行所过之地，五百里内的居民，都得贡献食物。同时又强迫征兵一百多万，侵略高丽。上举的第一首诗，表现出挽船夫的悲苦生活。哥哥出征，饿死山下；自己又被征挽船，身亦难保。“悲损闺内妻，望断吾家老”，真是妻离子散，民不聊生。此诗虽出于小说体的《海山记》，但很真实地表现了穷苦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的怨恨。第二、三首，更显出民歌作品的特色，由怨恨的抒情，成为真刀真枪的造反了。据《通鉴》云：“邹平民王薄拥众据长白山（今山东章丘、邹平一带），剽掠齐、济之郊，自称知世郎，言事可知矣；又作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以相感劝，避征役者多往归之。”（《隋纪五》）由此而推，上面所举的《长白山谣》，很可能就是王薄所作的《无向辽东浪死歌》。所谓“无向辽东浪死”，就是叫老百姓不要到高丽去打仗送死之意。第三首，也流传于当时长白山区域，想也与王薄有关。王薄是在隋炀帝残暴统治下，首先发动农民起义的领袖。他用诗歌作为激发人民、组织人民的斗争武器。他自称为“知世郎”，他认为世事是可知的，这表明他对于起义战争的认识和信心，同时也是对于儒家天命论的否定。诗中语言质朴，气魄雄伟，刻画形象，鲜明生动。“上山吃獐鹿，下山吃牛羊”，显示出起义军的山野生活；“忽闻官军至，提刀向前荡”，表达出起义军天不怕、地不怕的英勇气概；“敛起铁来做成枪，昏君脏官杀个光”，反映了广大穷苦农民阶级斗争的强烈感情。这样优秀的民歌作品，可惜流传下来的太少了。

王薄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烽火，很快地就燃烧到南至岭南、西北至陇右的全国各地。根据史书的记载，当时先后爆发的农民起义，大小约有一百二十多处，把隋朝统治者的军队，打得落花流水。当时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斗争，反映了穷苦农民及广大人民对隋朝统治者的强烈仇恨。当时的社会情况是：“官吏贪残，因缘侵渔，百姓困穷，财力俱竭。安居则不胜冻馁，死期交急；剽掠则犹得延生，于是始相聚为群盗。”（《通鉴·隋纪五》）所谓“相聚为群盗”，就是农民起义。这也说明了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残酷统治下，人民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，只有起来造反的一条路。隋代末年的各地起义军，互相呼应，愈战愈勇，沉重地打击了士族豪强，横扫了孔孟之道的妖风，歼灭了隋朝的主力军，号称“甲兵强盛”的隋朝统治者，在农民革命的强大威力下土崩瓦解了。在当时农民起义的狂风暴雨中，关陇贵族李渊、李世民父子，也以反隋为号召，终于窃取了农民战争的果实，建立了唐朝。

二 唐代社会概述

唐朝是一个经济发展、强大统一的封建帝国。由于隋代末年的激烈阶级斗争，推翻了腐朽残暴的隋朝统治，扫荡了孔孟之道，打击了士族豪强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正如毛主席所说：“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，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，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”（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）在这种形势下，当时劳动人民的地位，也起了一定的变化。晋代以来，地位近于奴婢的佃客、部曲，是社会生产的主力，到了唐代，这种情况有所改变。当时作为社会生产主力的，是不同形式的租佃农民。唐朝统治阶级对农民

的剥削,主要是用契约来规定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,规定缴纳地租的数额和方式,相对地减少了无偿的劳役,这在当时,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。同时,从唐初以来,全国大修水利,见于记载的有一百多处。北方水利工程,主要是开渠引水,南方则注重于排水和蓄水。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,从而出现了许多新的生产工具,提高了生产力,如深耕犁和转轮水车等等,都是前代所没有的。随着农业的发展,手工业也有很大进步。唐代的纺织、陶瓷、造纸、造船、采矿各业,在其分工的细致、技术的改进和生产的规模上都超过了前代。由于广大农民、手工业者的辛勤劳动,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,这就是唐朝得以繁荣昌盛的主要原因。毛主席说:“在中国封建社会里,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、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,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。”(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)

其次,由于隋代的农民起义,摧毁了以隋炀帝为代表的儒家路线的反动统治,作为儒家路线阶级基础的豪族地主,在农民起义中,受到了比地主阶级其他阶层更为沉重的打击。在这样的基础上,李世民、武则天能先后推行法家路线,并取得胜利,在建立强大统一的唐朝过程中,作出了贡献。在他们的统治时期,消除了少数民族贵族军事集团的侵扰,保卫了边区劳动人民的生产;同时采取了维护统一、加强中央集权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各种措施,有力地打击了旧有的豪门地主,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。当时唐朝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成就,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。唐初户口不满三百万,到武则天末年,增加到六百多万户。隋代末年的米价,有的地方高至每斗千钱;高宗、武后时期,米价最低时,每斗不过五钱,这都反映出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。当然,李世民、武则天的所作所为,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,是以巩固封建政权为目的的。李世民也搞读经,武则天也搞尊

佛，都是作为统治人民的手段。为了他们自己的豪华享受，也大兴土木，对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，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。但是他们在农民阶级斗争的推动下，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，在政治上推行法家路线，发挥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。

封建社会的历史家、文学家，都把开元、天宝年间称为“盛世”。开元时期确实还能显示出一点太宗、武后时期的余威；到了天宝年间，外貌似乎强大，内部却已腐烂，孕育着各种复杂的矛盾。玄宗（李隆基）反法尊儒，在开元二十七年封孔丘为文宣王，天宝二年在秦始皇坑儒故址，“立祠宇以祀遭难诸儒”。并且用人唯亲，把政权交给李林甫、杨国忠一类权奸。豪族地主剧烈兼并土地，破坏了均田制度。杜佑说：“虽有此制，开元之季，天宝以来，法令弛坏，兼并之弊，有逾于汉成、哀之间。”（《通典·食货》）这表明玄宗推行儒家路线，则是由于阶级斗争形势和新起的豪族地主势力所决定的。在玄宗的统治下，特别在其后期，政治腐败，军纪废弛，赋税繁重，人民穷困，在各种矛盾的激化中，终于爆发了安、史之乱。长达八年的安、史之乱，是唐朝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。它结束了唐代的前期，标志着唐代后期的开始。安、史乱后，江南一带的农业、工商业，虽仍然继续发展，但北方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。并且当地军阀，各霸一方，开始形成割据的局面。他们各自为政，“招还散亡，治城邑甲兵，自署文武将吏，私贡赋，天子不能制。”（《新唐书·藩镇卢龙传》）各地藩镇互相联婚，互为声援，自己统治的地区，死后传之子孙，或为其部将所袭，朝廷不能过问。这种情形，实际上是搞独立王国。在八世纪后期，全国的大小藩镇有四十几个。后来愈演愈烈，到了唐代末年，成为“无地不藩”，“无藩不叛”，终于演成为“五代十国”的局面。在藩镇的统治下，人民蒙受深重的苦难。藩镇一面残酷地剥削人民，一面强迫人民当兵。“计户口，重赋敛，厉兵缮甲，使老

弱耕，壮者在军。”（《新唐书·藩镇魏博传》）“尽发部内男子十五以上，七十以下，各自备兵粮以从军，闾里为之一空。”（《旧五代史·刘守光传》）在晚唐不少诗人的作品里，都反映出当时人民遭受藩镇剥削、压迫的苦难生活。

由于玄宗的荒淫腐化，宦官因而得势。“开元、天宝中，宫嫔大率至四万，宦官黄衣以上三千员，衣朱紫千余人，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将军，列戟于门。其在殿头供奉，委任华重，持节传命，火焰殷殷动四方。所至郡县奔走，献遗至万计。修功德，市禽鸟，一为之使，犹且数千缗。监军持权，节度返出其下。于是甲舍、名园、上腴之田，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。”（《新唐书·宦者传序》）。非常清楚，这些掌权得势的宦官，都是豪强地主的代表人物。李白有诗云：“中贵多黄金，连云开甲宅。……鼻息干虹蜺，行人皆休惕。”（《古风》之二十四）诗中的中贵，就是指的宦官。安、史乱后，宦官权势更进一步扩大，先后掌握了处理军政和调遣军队的大权。禁军和枢密使，是当时中央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，都先后落入宦官之手。于是他们可以为所欲为，皇帝终于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。代宗（李豫）时，宦官李辅国对他说：“大家（指代宗）但内里坐，外事听老奴处置。”（《旧唐书·宦官传》）文宗（李昂）一面哭泣一面自叹地说，他还不如周赧王和汉献帝。“赧、献受制于强诸侯，今朕受制于家奴，以此言之，朕殆不如。”（《通鉴·唐纪六十二》）真可谓有自知之明。结果宦官在唐朝后期，已经掌握了君主废立的大权。如穆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懿宗、僖宗、昭宗都为宦官所立，而宪宗、敬宗，都是被宦官害死的。当时当权的宦官和外面的藩镇以及朝廷中的高官显贵，在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方面，是互相勾结，狼狈为奸；在争权夺利方面，又是互相倾轧，你死我活。结果把当时的政治，搞得腐败黑暗到了极点。苛捐杂税，无所不有；两税之外，还有间架税、除陌钱、地头